

目摇摇录

前摇言	(员)
-----------	-----

第一章“趋利”——明清时期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

摇摇摇	(员)
摇一、拜金主义盛行	(圆)
摇二、求利的社会心理趋势	(苑)
摇三、义利之辩	(员猿)

第二章“求富”——明清时期商业观念的变迁

摇一、关于弃农从商	(圆四)
摇二、关于弃儒从商	(猿四)
摇三、关于官僚经商	(源四)
摇四、关于抑商	(缘四)

第三章“崇富”——明清时期人际交往观念的变迁

摇摇摇	(苑四)
摇一、新型人际交往关系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	(苑四)
摇二、等级的淡化	(愿四)
摇三、婚姻关系的缔结	(愿四)

第四章“显富”——明清时期消费观念的变迁	(四四)
摇一、“由俭入奢”——消费习俗的变化	(四四)
摇二、显富、竞富的社会风尚	(四四)
摇三、“崇奢”与“禁奢”的冲突	(四四)
第五章“保富”——明清时期财富观念的变迁	(四四)
摇一、土地买卖广泛而频繁	(四四)
摇二、贫富升降迅速	(四四)
摇三、保富思想与治生之学	(四四)
摇四、宗族组织——实践治生之学的典型	(四四)
结语语	(四四)
摇一、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思想观念	(四四)
摇二、立足于明清的考察	(四四)
摇三、明清思想观念变迁的启示	(四四)
参考文献	(四四)
后摇记	(四四)

前摇摇言

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从其对交换的依赖程度来划分，有两种，即自然经济（或称自给自足经济）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来说，它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它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内容，以货币关系为典型特征。而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经济，还是奴隶制经济、封建经济，都属于以物质生产的自我满足为本质特征的自然经济。只是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经济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终瓦解了自然经济而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形式。但是，商品经济早在原始社会中即已萌生，在随之而来的历史社会中，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日益成为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因此对社会的各个方面也逐渐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我们说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①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②“商人对于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了这

① 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8—29 页。

② 《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45 页。

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①“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产生的个人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世界”。^②显而易见，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商品经济是人类经济、社会及其运动的一种基本要素和动因，商品经济的发展乃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重要起点和基本杠杆。因此，在研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别是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就不能不注意商品经济状况的研究，应始终把商品作为观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基本视角。这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应该说，随着近 150 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史学界对于商品经济史的研究还是十分注重的。这不仅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有着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自然也就包括了较发达的交换和货币经济，其中唐宋以迄明清的商业化倾向尤为引人注目；更因为商品经济是社会发展变革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任何一个社会产生急剧变革的时期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从而搞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成为当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大问题，特别是今天我们面对着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就更是不能不在历史的反思中反复思考。如何和为何要更高、更快、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很自然地，对商品经济的研究，近 150 年来一直是史学界最为重要和热门的课题之一。这也是本文所以选择这样一个题目的基本原因。

在长达两千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5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3 页。

个发展的高峰阶段，它们分别是秦汉时期，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这三个时期，不论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思想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把中国封建社会不断推向更新的水平。就社会经济而言，如果把唐宋时期看成是一个商品经济发展的高峰，那么明清商品经济的水平则是这一高峰的绵延和发展。明清之际，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水平都超过了其他时代，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商品经济也在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无论是商品流通，还是市场规模，抑或是商人资本的实力和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潜滋暗长以及市民阶层的不断成熟和壮大，封建社会的内部格局及利益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封建制度迅速进入了一个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时期，有人甚至把明清时期称为“变态的封建社会”。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将眼光投向这个特殊的时期，尤其是投向当时的商品经济。

物质决定着意识，这是唯物论的基点。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之间的消长变化，反映并且必然导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应该说，这种迹象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传统的思想观念已经受到冲击和挑战，但变迁的各方没有达到一种协调，或者说不具有广泛性，所以并没有形成一种带有时代特征的强烈的社会风尚。明清之际，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由自然经济社会存在所决定的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空前巨大的冲击和排斥。在面对商品经济发展一浪又一浪的高潮，人们从前的许多认识不得不接受商品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变革一次又一次的洗礼，从而也就由此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变化，出现了诸多反传统的观念，并具体表现为种种社会风尚的变迁。旧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新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发生了激烈冲击和碰撞，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这些思想观念的变迁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特点，同时作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力，它们同样也

对明清乃至明清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并进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势。

如此看来，商品经济与思想观念变迁之间的确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它的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学者对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位置、作用、特点等的讨论，亦不同于传统中国经济思想史着重于分析明清时期经济思想家和他们的言论主张，分析传统思想对现代化的价值，总结中华文明宝库中丰富的经济思想，提炼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与理论之长的研究。当然，这两方面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可否认的，特别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政策制定、国情认知、观念变革、企业文化建设等都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多年来研究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与经济思想的成果不可谓不多。

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是较早对封建经济结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察的理论性专著。傅筑夫的四卷本《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以及《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和《中国经济史论丛》，自成体系。冷鹏飞的《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以古代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形态为基本构架，以时间为支柱，分别考察古代商品经济内部结构发展演变的历程，然后从各构件的相互关系中寻找其运行规律及其社会原因。傅衣凌的《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论述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与封建制度对立的一种力量，明清商业资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若干历史前提”。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由手工业部门向农业延伸，并且由地区性研究向综合性研究发展，重要的专著有：李文治等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刘永成的《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洪焕椿、罗仑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

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发展前期的系统性代表成果，就是胡寄源

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三卷本，其研究起自上古止于鸦片战争，1989年另有《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出版。“文化大革命”后系统性的著作如叶世昌等的《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也是三卷本，研究时段拓展至五四运动前。同时，成果中专题性、类别性、断代性的著作逐渐多了起来，如姚家华等的《商业经济思想史》，周伯棣的《中国财政思想史稿》，吴申元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叶世昌的《中国货币理论史》，赵靖的《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概论》，欧阳卫民的《中国消费经济思想史》，钟祥财的《中国农业思想史》，吴松主编的《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唐任伍的《唐代经济思想研究》，巫宝三主编的《先秦经济思想史》等，标志着本学科研究的深入化。资料的发掘也有很大发展，如巫宝三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从先秦至明清共分五卷先后出版，配套的系列专著已出版“先秦卷”七十余万字，其余待续。现今，代表这一学科系统研究较高成就的，是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四卷本，此书起自上古止于1949年，纵贯四千余载，洋洋1400万言，研究撰著历时十余年，颇多理论建树与观点新论。

毫无疑问，这些成果为创新中国的经济科学提供了借鉴，又丰富发展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更为可喜的是，经过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已使越来越多的人形成一个共识：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

不过真正把社会经济环境与思想观念变迁结合起来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成果却很少。邵鸿的《商品经济与战国社会变迁》以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跳出单纯就生产力、生产关系研究战国社会变革的传统路径，系统全面地

考察了商品货币经济在战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表现、特点，及其对战国和此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叶坦的《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是第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断代史研究专著，它从新的视角对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做了有益的探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变迁论》指出：16世纪开始，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都发生一系列变化，“出现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乃至“叛逆思想”。这些成果都以不同篇幅论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变迁，代表了国内学术界在这方面课题上所达到的较高研究水准。

但总的来说，对于站在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高度，研究思想观念变迁影响下的经济行为、经济现象如何反映社会流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不平衡如何被重新整合，达到新的社会平衡等方面还做得不够。或者说，以前的研究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生活，所反映的广度、深度和自觉程度都是远远不够的。在系统研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与思想观念变迁二者关系的问题上，更是还有可努力的余地。

换言之，我们现在更需要的是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历史。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历史划分为不同的门类来研究，并也在各个专门史领域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毕竟不应该是单纯的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或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而应是整体的社会史研究。社会史的真正特征和魅力，便在于它的这种总体性。在研究中一定要注重研究对象的社会整体性。只有把特定的历史社会或具体事物放到一个更广阔的时空背景和广泛联系之中，不仅弄清其是什么，而且也明了其为什么会产生并且对更大的历史系统发生了何种影响，才是真正的总体的历史研究，才能对历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有较大助益。特别是在今天，在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的今天，经济史研究更应该综合考虑人与自然、经济与社

远

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既着力把握决定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经济结构，又全面展示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内容，同时对决定整个社会面貌的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探讨。新世纪的学术发展，要求在“精深”的同时也要求“广博”，诸如行为方式、制度变迁、道德伦理、观念意识等越发应为经济史研究所不容忽视。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和明清时期虽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自然就引导我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历史上明清时期所发生的类似现象进行追寻和思考，寻求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规律性东西。如果说，过去人们的社会历史活动是自发的，那么而今我们则是在自觉的状态下，通过探寻并尽可能地实现社会本质规律的要求来推进社会的发展。因此，对明清思想观念变迁的研究，无疑可以为现实社会的改造提供历史的借鉴。

正是有鉴于此，我产生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商品经济与思想观念变迁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想法。选取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空前发展，从而导致社会急剧变革的明清时期作为论文撰写的历史背景。论述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关系造成的社会价值冲突及其重新整合，通过论述人们在价值冲突之下表现出来的种种社会风尚、生活习惯、行为趋向等方面的变化，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思想意识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经济发展是与一定的经济伦理相适应的。任何历史时期，由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决定，人们的观念取向大体是相同的，其社会风尚的内涵是相对稳定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是引导人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正确发展的决定性的因素。

本文就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以“趋利”这一价值取向的变迁作为明清时期社会思想观念变迁的重要思想基础，在此之上论述人们营求财富、尊崇财富、炫耀财富及保护财富的思想行

苑

为和心理趋势。通过这样的论证，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哪种思想观念的变迁，都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商品经济的欠发达是明清时期最大的时代特征的话，那么当时思想观念体系中存在的种种变迁的历史局限性正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具体表现。而且作为人们行动的指南，这些新的思想观念决定了人们的利益选择，对明清时期乃至以后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述往事，知来者”，历史的经历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发展都是要与一定的道德伦理相结合的。面对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建立健全商品经济伦理的有效机制。提高全民的商品经济伦理观念，发挥社会风尚的功用，遵守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使转型时期观念的变革更代表先进的主流文化，更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更有利于稳定现有的社会制度。使之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推动社会进步。这无疑是明清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大环境中思想观念变迁对我们今天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大启示。

第一章 “趋利”——明清时期 社会价值取向的变迁

每一社会都有一些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从而出现普遍一致的或大部分一致的行为定势，或曰社会价值取向，如对知识的追求，对权威的崇拜等。这种社会价值取向是依据一定的社会标准对自我、社会及其相互间的价值变量关系做出功利性评判与选择的过程和趋向，是价值观的动态发展，是一种见之于社会并反映一定社会的价值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中，价值取向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它既受主体需求指向的支配，是对于主体需求的一种内在的抽象性评判、选择；又受着社会需求指向的制约，是对社会需求的主体性的评判、选择。如此，要了解明清时期的社会价值取向，我们就要先搞清楚当时社会性需求的总体指向。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唐宋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形成了空前的繁荣之势。同时，作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不断引起社会经济领域的变迁，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环境，也诱发了新的社会需求趋向，进而导致新的价值取向。越来越多的人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意识到金钱的潜力，于是起而追逐金钱与享乐，鼓吹个性与自由。各种社会变革的新因素在经济的滋养下快速生长，明清之交的中国社会，思潮翻涌，人心骚动。可以说，人们

在享受商品经济繁荣带来的经济成果的同时，其反映社会存在的价值观念也在不断经受着商品经济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洗礼。在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上都有深刻变化。

一、拜金主义盛行

商品货币经济必然带来拜金求利观念的泛滥，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与商品生产是分不开的。”^① 在市场与价值规律的利益诱导和无情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济本身总是具有最大限度利润追求的特征。尤其是货币出现以后，商品所有者的收入不再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价值和一切商品的权力象征的货币形式出现，他们对利润的追求就又具有了拜金主义和无限扩大的趋势。因为“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做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做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形式——的权力也日益增大”。^② 当商品经济把社会上的一切都卷入交换旋涡时，金钱支配了社会，从而拜金主义的观点也达到了顶点。

事实正是如此，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白银取得了法定货币地位，货币经济相应发展，人们交纳赋税、领取俸饷、支付工值，乃至交换一切商品，无不用银。换言之，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对市场的依赖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从吃的、穿的到用的，人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只要你有钱。有了钱，就意味着有了一切，金钱万能，金钱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如此，正因为金银在社会生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②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7页。

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以致上至天子，下至人民，无不对金银趋之若鹜。崇拜金钱，贪求财富成为当时社会盛行的风尚。

金钱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魅力，其人格化的倾向非常明显。它再不是人们鄙视的“阿堵物”了，而成为世人眼中艳羡的“孔方兄”。《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中常时节把西门庆给的十二两碎银子放在桌子上，说：“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对金钱垂涎欲滴的嘴脸，可谓是活灵活现。

金钱就像瘟疫一样，传染到生活的各个角落，一切都被异化，成为变形的东西：“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挡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洗净。”^① 不难想象，既然金钱万能的意识在明清时期盛极嚣然，那么在金钱的再分配上便会抛弃一切顾忌。

为了金钱卖身卖命都可以，《沙溪集略》载商人凌珊事：“嘉靖庚戌，倭奴猖獗，掠江南北诸郡，公在瓜州围城之中，城旦夕且破，守者计无所出。公奋然曰：‘是非重赏无以得死力者以保危城。’即解千金装，散诸少年以为倡，从而解者各有差。诸少年踊跃登陴，倭奴疑有备，宵遁。”在这条史料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金钱对于人们的行为有着一种魔力，甚至使人在生死关头也不忘为“钱”而战。

在金钱的诱惑下，背信弃义、寡廉鲜耻的事也屡见不鲜。《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富商陈朝奉看上了开酒店的李方哥的妻子陈氏，表示要出三十两银子“销魂”一夜。李方哥听后，不是勃然大怒，拍案而起，感到自己作为丈

^① 明·朱载堉：《醒世词·骂钱》。

夫受到了侮辱，而是像做一笔有利可图的买卖那样，郑重地与妻子商议：“我们拼忍着—时羞耻，—生受用不尽了。而今总是混账的世界，我们又不是阔阔人家，就守着清白，也没人来替你造牌坊。”妻子陈氏回答：“是倒也是。”于是决定用贞节换取三十两银子。贞节倒不如金钱有价值。

正是应了当时很流行的一首《题钱》的歌：“人为你跋山渡海，人为你觅虎寻豺，人为你把命倾，人为你将身卖，人为你亏行损德，人为你断义辜恩，人为你失孝廉，人为你忘忠信；细思量多少不仁，铜臭分明是祸根，一个个将他务本。人为你心烦意恼，人为你梦扰魂劳，人为你易大节，人为你伤名教；细思量多少英豪，铜臭分明是祸苗，一个个因它丧了……”^① 真实而又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当时的拜金主义行为倾向。

拜金之风还侵蚀了往日温情脉脉的伦理规范，使得世风日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伦理纲常荡然无存，王丹丘在《建业风俗记》中描述：“嘉靖以前，人们遵礼循法，年幼的看见尊长的，都还彬彬有礼，然而如今礼法却荡然无存，甚至敢与长辈抗衡并列，还有骑驴见到尊长连驴也不下的。”在祭祀方面，“薄于先祖，厚于亲姻，急于鬼神”。^② 原因在于，鬼神比祖先的灵魂更好使，能够保佑平安，帮助获得钱财。对亲姻的先祖厚重，更多地是看在活人面上，平常借这些往来礼节搞好关系，一到用时就能有求必应了，这哪还有什么孝道，连已故的祖先也用来为自己拜金求利的意识服务了。更有“贪婪罔极，骨肉相残”^③ 的现象。还有的地方，“凡女出嫁而死者，往往讼

① 明·薛论道：《林石逸兴》，卷缘

② 弘治《吴江县志》，卷远，风俗。

③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獬，引《歙县志》。

其婿家，以冀索妆奁之余润”^①。在货币经济的作用下，连基本的伦理道德都抛到一边去了。

对金钱的崇拜还让人渐养成吝啬的性格。嘉靖年间，吴县有位姓蒋的举人，屡考进士不第，索性经商。鸡鸣而起，至晚持筹数缗，居积取盈，算入骨髓。别说让他办些公益事业了，“虽至亲，不拔一毛”。^②类似的例子在明清很多，所谓“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③亲戚间只要有贫富之分，富有者常恐贫弱者贷款借米，便远远地疏离他们，就是来到门上也只是冷冷地应付过去，使他们感觉无趣，以后便不常来，所以当时有“劝人没钱休投亲，若去投亲贱了身”^④的说法。

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追逐金钱的欲望，金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空前提高。人们逐渐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重财重利，崇拜金钱，追求金钱，把金钱确定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和评价标准，无怪时人感慨道：“金钱之神，莫基于今之时矣”^⑤，“金令司天，钱神卓地”^⑥。

拜金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对“钱”（财富）的推崇和追求。它认为在人世间的所有价值物中钱的价值最重要，对人最有意义，它高于一切、超越一切，把钱作为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其他事物、其他价值，无论是良心、正义、荣誉、声望，还是家庭、民族、朋友、爱情，与钱比较起来都是次要的，当它们与钱发生冲突时，理所当然地选择金钱而抛弃后者。因为钱可以购买、替代其他一切价值。有了钱什么东西都可买到，任何愿望都

① 明·张肯堂：《荃辞》，卷愿，《石明武》。

② 明·陈良谟：《见闻纪训》。

③ 明·薛论道：《林石逸兴》，卷愿

④ 明·朱载堉：《醒世词·叹人敬富》。

⑤ 明·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愿

⑥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獬豸，引《歙县志》。

能满足，甚至单单有钱本身，就可使人获得巨大的满足，弥补缺少道德、知识、家庭等的一切缺憾。

当然，拜金主义并不是自明清始，西晋鲁褒的《钱神论》说明当时已经存在拜金主义的社会意识了，但明清之际拜金主义的影响无论在范围或是在程度上又都是之前历史时期所比之不及的。清初文学家廖燕曾写过一篇新的《钱神论》来揭示当时拜金主义的状况。他说：“每怪人为万物之灵，万物皆其所役使，而独见役于一物。一物者何？钱是也。自有此物以来，无贵无贱，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靡无争趋之惟恐后。熙熙攘攘，至于今为特甚。有之则可以动王公，无之则不足以役奴隶。呜呼异哉！神盖至此乎！今以神称之，洵乎其为神也已。”^①人们把金钱奉为神明，金钱成为人们灵魂的主宰，成为人们唯一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整个社会陷入了一种崇拜金钱，追求金钱的迷狂状态。

拜物主义、拜金主义成为明清社会生活中的“精神大旗”。按说，本来“物”和“金”并不是什么坏东西，相反，它们理应是人们追求的东西，但如果人们把“物”和“金”看成是神秘的、超自然的、支配人们命运的力量，因而对其产生的迷信和崇拜，甚至成为一种“主义”，那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证明，在这种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求利的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单纯地追求利益，否定索取的条件性。金钱的魔力可谓是几乎无所不在，现实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呈现出难以想象，甚至是不可理喻的“合理”，而这样的矛盾亦使人的浅薄与庸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① 转引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44页。

二、求利的社会心理趋势

这种拜金之风，直接导致明清时期人们求利的心理趋势越来越明显。可以说，明清时期是世风由质趋文，从淳朴至浸染骄奢，从安于耕作趋向汲汲求利的时期。“今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蝇营狗苟，至老死而不知止者”。^① 利欲观念的传播和扩散，使整个社会陷入利来利往的泥淖，“世俗竞鹜于其所欲得，而日强其力所不能……敝敝于一生之勤，心疲业废，趋死而后已。”^② “人皆慕荣华、争名利，静养性灵者无一人。”^③ 即是对明清时期在诸社会阶层中泛起的利欲主义狂潮的反映。

这种求利意识，首先就突出表现在与商品经济直接联系的工商业者中。他们一般的商业利润自不必多言，这一时期更出现一些工商业者操纵地区产地市场或深入农村直接控制小生产者的包买垄断行为，以攫取超额利润。此外，高利贷剥削盛行，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一些握有巨资的工商业者们追逐高额利润的心理趋势。然而，拜金求利意识在明清时期则已远远超出了工商业者的范围，而广泛扩展和存在于各个社会阶层，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和世风。

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平常时候，人们之间相安无事，“平居则相与握手、附耳，以致欢欣、爱洽”。一旦到了利害攸关的时刻，其拜金求利的原形便显露无遗了，“及科势位一接，幸于得而忘其所以为义，丑诋而疏排，阴挤而阳夺，不得之不已。心术之移于利也”。^④ 而坑蒙欺侮，骗人钱财

① 明·陈良谟：《见闻记训》。

② 明·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八，李君墓志铭。

③ 明·王文禄：《竹下寤言》，卷四，《良贵篇》。

④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缘，《朋友》。